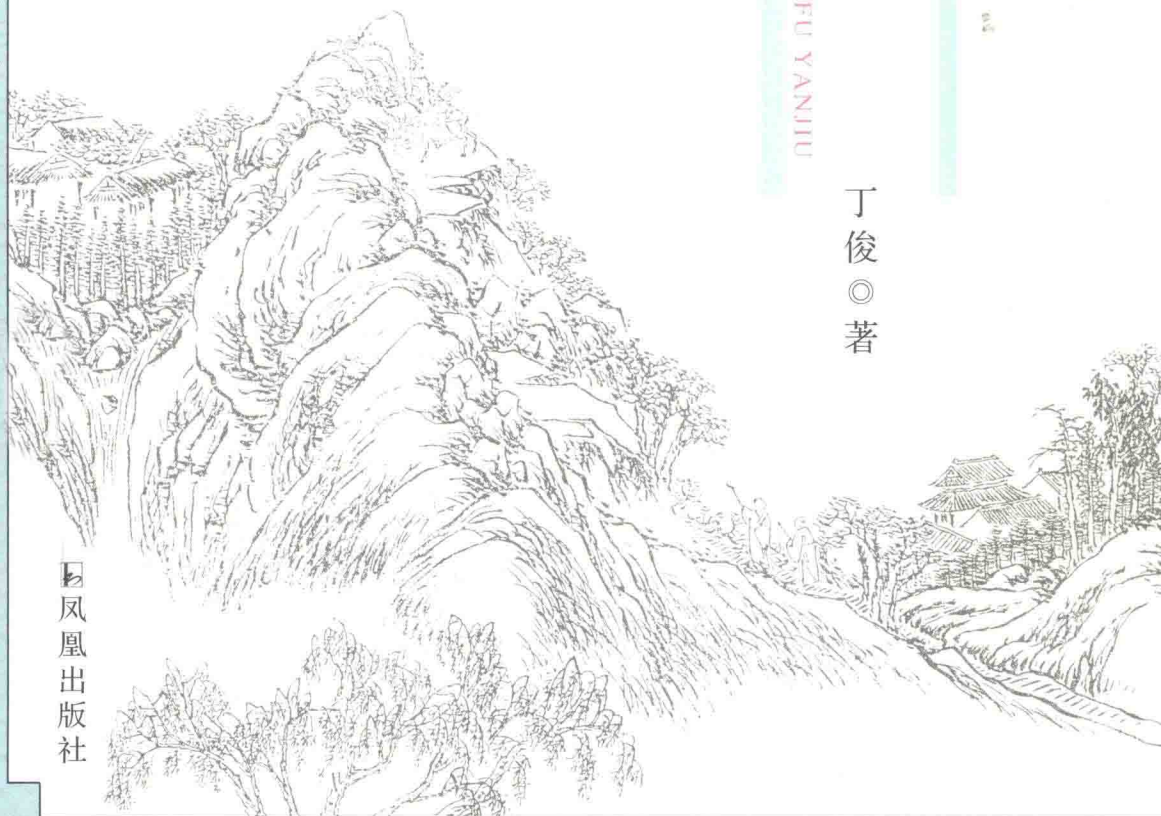


# 李林甫研究

LILINFU YANJIU

丁俊◎著



凤凰出版社

# 李林甫研究

丁俊◎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林甫研究 / 丁俊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506-1951-7

I. ①李… II. ①丁… III. ①李林甫(683~75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755号

- 书 名 李林甫研究  
著 者 丁 俊  
责任编辑 汪允普 王淳航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210038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21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951-7  
定 价 9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68037410)

## 李林甫研究序

中国传统史学重人物。司马迁创建纪传体，不仅后世继承不坠，而且蔚为大观，号称正史。编修一国一朝之史，平衡事件轻重缓急，明了时代的承转启合，惟有纪传体为最佳选择。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是中国史学家的基本看法。后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成功，为编年体挣得荣誉，成功的原委也有对纪传体经验的吸收。纪传体不仅具备历史的承载量，而且寓褒贬于叙事，尤能体现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观。历史人物不仅在历史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历史人物的历史选择，也往往体现着忠奸善恶、是非曲直，为读者提供成败荣辱的借鉴，鼓荡后人勇猛精进的雄心壮志。

近代史学发展，更重视展现新的历史观。一方面，探究个人历史选择的背后动因，社会史、民众史于是成为更重要的史学概念。发现历史人物个人选择的历史限制，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明了历史选择的规律，本来也应该有利于推动历史选择的多方面研究，尤其是历史选择自由度问题，自由与限度并存，即使伟人也无法避免。那么，历史伟人的价值何在？他们突破了常人的限制，扩大了历史选择的自由空间，社会前景在他们的奋斗面前变得明亮，民众簇拥着他们的英雄，共同赢得了胜利。另一方面，探究历史背后的隐性因素太有吸引力，研究者有时会沉浸在无穷的探究迷宫中难以自拔，所以读者常常等不到原本的研究结论。有的研究者甚至理直气壮地宣布，历史没有方向与规律，历史学没有目的。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去，如今的历史研究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不断地后退，让位于制度、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等等。告别了英雄时代，近代社会更应该强调人本身，但历史人物却在历史研究中与中心地位渐行渐远，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实。历史学的研究，未来会进一步远离社会和人的需要

吗？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何在？历史学到底还能不能为人的历史选择提供参考？历史学继续沉迷于自我设定的象牙塔中，它自身的前途何在？

不管史学如何发展，围绕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重重迷雾，永远吸引着后人的注意，认为这是历史学万古长青和迷人魅力的根由，自然不乏证据。释读一个甲骨文与发现一颗新星，到底谁的价值更大，这一定需要冗长的论证，但理清一个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恩怨，不仅有利于读者了解历史及其错综复杂，也有利于读者理解历史学的阁楼奥秘。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虽然叫做历史平反，但原本就是史学的当然使命。一个久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他的命运竟然在千年之后获得改变，一个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终于除去他的时代为他设立的枷锁。那段尘封的历史，固然依旧没有改变，但在后人心目的地位却获得截然改观。我们站在历史的身后，不断享受着历史的丰厚馈赠，偶然，我们也会灵光一现，忽然发现历史的一则秘密，这即使不可以算做是对历史的回报，但应该看做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历史通往未来的漫长道路上，我们在这里做下这个小小的记号，希望引起后人注意，或许会有人拈花一笑。

遭遇李林甫，对于唐史研究者而言并非难事。唐朝的重大历史转折发生在唐玄宗时代，繁荣之后的深度混乱，唐朝经历了的极速过山车的痛苦考验，而带来这一变化的安史之乱，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这跟李林甫有关。唐玄宗，这位唐代寿命最长的皇帝，他英明与愚蠢同体，他的心智和认知直接引发了唐朝的巨变，而他自身的变化，据说也与李林甫有关。李林甫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之一，他众多的同事都惨遭他的毒手，有消息说他有一个专门从事思考的秘密场所，而他思考的问题无一不是如何整掉同事。李林甫是开元盛世时期的主政者，但人们记得更多的是他如何为唐朝带来了灾难。李林甫做的坏事太多，以至于很少有人去问，如此坏人为什么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仅仅是因为他的斗争技术高超吗？李林甫的发迹史，需经过认真清理，才能理解李林甫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李林甫到底对开元时代的唐朝有无贡献，这是理解李林甫获得宰相之位的关键。李林甫是被杨国忠打倒的，从此李林甫的罪行不断增加，直至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知道李林甫罪孽深重。打倒李林甫是杨国忠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这在充满权力斗争的朝廷并非

不能理解。但是，当杨国忠也葬身马嵬驿之后，为什么对李林甫的追击并没有停止？是什么势力继续主导着这项事业？这场追击战的最后成果，李林甫终于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旧唐书》已经给了李林甫极大的恶评，到《新唐书》，李林甫直接进入“奸臣类传”之中，永无翻身之日。越是典型人物，研究价值越高，李林甫就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很别致的课题。

对于李林甫的研究，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多年前就著有《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一文，系统地分析了安史之乱与李林甫的关系，对长期以来李林甫责任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吴先生的研究，正是后来丁俊从事李林甫研究的学术基础和思想先导。跟吴先生读书，首先要熟悉唐朝的制度，而唐朝的制度无疑以《唐六典》最为重要。在学生的时代，吴先生要求我们熟读《唐六典》，等到自己也做了导师，就对吴先生的做法照搬照抄，也让自己的学生熟读《唐六典》。丁俊在硕士研究生时期就跟我读书，阅读《唐六典》十分细心，在统计所涉职官的时候，终于发掘到了李林甫。李林甫是《唐六典》的最后主编，他把自己的政绩不失时机地放置在《唐六典》之中，以往学界十分重视《唐六典》的制度史价值，而常常忽略《唐六典》中的李林甫研究资料。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发现，不论是新课题还是新资料，研究将无从说起，而丁俊发现的李林甫新资料，不仅对李林甫研究意义重大，对于研究者的触动同样巨大。丁俊开始全面搜集有关李林甫研究的资料，不管是史料还是研究信息，全面系统过滤唐宋文献，力图把李林甫研究的所有资料一网打尽。最终，丁俊以《李林甫新研究——以〈唐六典〉为中心》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虽然写了十多万字，但依然有言不尽意之感，毕竟李林甫涉及的唐代问题太多。

丁俊在读博士之前，一边尽相夫教子之责，一边继续李林甫的研究。当她再次回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一手拿着博士生录取通知书，一手抱着这部几十万字的书稿。这两年，丁俊一边忙着博士课业，一边修改她的书稿。如今，丁俊的《李林甫研究》终于要出版面世，回想最初的《唐六典》阅读，竟然已是九个春秋。从当初吴宗国先生的一篇论文，到丁俊一本厚厚的专著，薪火相传的魅力，于此尽得展现。

李林甫身后的很多事，李林甫是再也感知不到了，不论是曾经的罪行堆积，还是如今的平静研究。然而今后，关心李林甫的人可以拥有一部可以信得过的学术专著，努力保持立场公正，全力保全所有证据，在集聚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智慧之后，希望理清许多是似而非的说法，还李林甫一个本来面目。或许，在现实世界的公平斗争中，有一个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公正地对待历史。

近些年，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是围绕唐高宗、武则天进行的，不管是唐代人物还是唐代政治，这些都与丁俊的李林甫研究前后响应，关联密切。随着学业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丁俊已经摆脱了初入学门的青涩形象，一条看得见的学术之路，正在她的眼前铺展延伸。作为导师，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学术友人，面对丁俊的成绩，满心尽是欣喜。

是为序。

孟宪实

## 李林甫：盛世宰相及其恶评（代前言）

李林甫是唐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宰相，他执政长达十九年，仅次于一代名相房玄龄，这在宰相任期普遍过短的玄宗朝是绝无仅有的<sup>①</sup>。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持秉钧衡将达半个玄宗朝的盛世宰相，他的历史评价却是负面的，甚至可以直接称之为恶评。然而，李林甫执政的时代，正是唐朝如日中天的时节，李林甫的恶评与他所处的盛世，看上去极其不协调。

对李林甫的恶评，多源起于他身死之后。例如，玄宗幸蜀后曾与给事中裴士淹于马上商较卿相，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sup>②</sup>。代宗时，颜真卿为反对元载百官论事先白长官的奏请，以李林甫为鉴，认为他是“权臣误主”<sup>③</sup>。德宗亦再三叹言“中原之祸，自林甫始也”<sup>④</sup>。到宪宗时，崔群指出“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

---

① 黄永年先生指出，开元时期的宰相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最长的源乾曜两个任期加起来，也不过九年九个月。（《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81页）李林甫任相长达十八年六个月，在玄宗朝是独一无二的。（《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页、226页）房玄龄任相二十二年，他大概是整个唐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宰相。（《旧唐书·太宗本纪》，第30页、61页）

② [唐]刘肃《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123页；[宋]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9页。

③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颜真卿传》，第3592—3594页。

④ [唐]李浚《松窗杂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7页。



元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sup>①</sup>。这个观点影响非常深远，它直接构成了宋人对于李林甫的评价与认识框架。《新唐书》将李林甫直接打入《奸臣传》，不仅接受了这种“奸臣”定位，更对一般读者产生深远影响<sup>②</sup>。而《资治通鉴》进一步具体化，罗列李林甫的四大罪状，得出他“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的结论，也是对于开元二十四年为理乱之分这一言论的继承与强化<sup>③</sup>。至于笔记小说，更是对李林甫的形象进行了极尽可能地丑化。例如“索斗鸡”、“肉腰刀”的比喻，“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由来，等等<sup>④</sup>。直至今日，许多学者仍深受传统认识的影响，或强调唐玄宗的用人失误<sup>⑤</sup>，或指责李林甫的专权

---

①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崔群传》，第4189页。此处“二十”当为“二十四”之误。

②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李林甫传》，第6343—634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第6914页。

④ 参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曾贻芬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47页、52页。

⑤ 王寿南《唐玄宗时代的政风》，《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35—271页；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66—74页；杨西云《从个人施政作风看唐玄宗统治的由盛转衰》，《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第32—34页；彭荷成《从唐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谈用人》，《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第118—121页；明秀丽《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04—106页；等等。

与独裁<sup>①</sup>，或抨击李林甫的道德败坏<sup>②</sup>，甚至断言李林甫是个有反叛之心的历史罪人<sup>③</sup>。总之，都认为李林甫的阴谋诡计胜于他的才干，并且他要为唐朝的由盛转衰负有首要责任。

但是，如此人物，有大臣对唐玄宗提出“陛下何用之久耶”？德宗也曾质疑“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sup>④</sup>？一位政府首脑仅靠政治阴谋就可以霸占相位长达十九年，这有可能吗？面对裴士淹的疑问，玄宗的沉默意味着其他答案的存在。而且，我们也无可否认，“开元全盛日”的盛世景象，是在李林甫任中书令四、五年之后出现的<sup>⑤</sup>，这一现实

---

① 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第一卷，筑摩书房，1950年，第80页（转引自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68年，第386页）；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年，第59页、102页；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198页；侯丕勋《李林甫专权与盛唐骤衰》，《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第63—67页；等等。

② 李哲夫、李广福《略论李林甫》，《人文杂志》1982年第4期，第78—82页；詹沛钜《“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历史知识》1982年第5期，第24—26页；赵映林《李林甫与天宝年间政局》，《文史杂志》2004年第4期，第59—61页；等等。

③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天津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唐华全《试论安禄山势力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89—90页；唐华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河北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24—30页。

④ 《松窗杂录》，第7页。

⑤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第213页）[宋]钱易《南部新书》卷辛：“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黄寿成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页）而在此之前，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已代替张九龄为中书令。（《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203—204页）

背景也足以印证，李林甫对于玄宗朝有着不可忽略的贡献。吴宗国先生比较早地指出，李林甫之代替张九龄，并不是用一个好人或用一个坏人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唐王朝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张九龄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所以被淘汰了。同时他也肯定李林甫是很有政治才干的<sup>①</sup>。学者们也开始强调对于李林甫的客观评价与正确认识。这包括，李林甫曾极力地维护过均田制与尚书省制度<sup>②</sup>，他在任用寒族为将方面的作用并非首要的<sup>③</sup>，还有，他本人具有极强的行政才干和制度创新能力<sup>④</sup>，等等。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对李林甫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传统局面，只不过，比起传统史学的强大存在，这些篇章仍然无法扭转李林甫上千年的奸臣定位。

对李林甫的研究，需要更系统的研究论证，平反与否并不重要，回归历史事实本身才是史学研究的根本，至少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资料的突破是首要问题。必须承认，传世史书对于李林甫的奸臣定位，影响了诸多的传世文献，而独立于这一系统的资料，现在看来，几乎唯有《唐六典》。通过对官修典籍《唐六典》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李林甫在任相初期的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为李林甫的政治才干提供了具体证明，同时也为李林甫时代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合理依据。以此为切入点，有关李林甫的功过是非就可以重新系统地展开讨论，有关玄宗朝的诸多

---

① 吴宗国《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8页；氏著《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② 池田温《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之考释》，《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1995年，第391—408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1页。

③ 郭绍林《安禄山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75—80页；郭绍林《解读盛唐须区分李林甫的小节和大节》，《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3—126页。

④ 宋社洪《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第67—73页。

历史也可以重新解读。这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改革。关于开元中后期的制度变革，吴宗国先生指出，开元初年开始的制度方面的变革，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后，开元十八年（730）开始又重新启动，李林甫执政后全面展开，到开元二十五、六年基本上告一段落<sup>①</sup>。那么，李林甫的具体改革到底都有哪些方面？《唐六典》注文中的资料给出了很充分的指引。李林甫在任相初期的一系列财政节流措施，以及他在开元二十二、三年所进行的机构改革，对于盛唐而言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学界的重视却普遍不足。财政改革对于这一时期的财政状况好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直接接续了李林甫后来对《长行旨》的修订，以及他以节流省便、“以乡土所出”为宗旨的赋税折纳，还有土贡改革。其中部分内容还成为一代制度，进入开元二十五年新修的令式。机构改革则成为有唐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冗官减省，它是这一时期使职系统发展的反映，并直接促成了开元二十五年官制的成熟与定型。与此同时，由于张九龄在任相期间对东北、西北边事的经略不够成功，暴露了唐朝在军事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才促成了李林甫变府兵制为募兵制的兵制改革，以及开元时期节度使体制的确立。此外，李林甫对于包括武举在内的选官与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都有着前后一贯的宗旨与处置措施。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李林甫为开天之际盛世形势的到来，所打下的制度基础与所做的现实准备，也是李林甫最终代替张九龄成为中书令的根本性因素。这与通常的李林甫评价，可以说相去甚远。

李林甫在开元年间所进行的诸多制度改革，之所以长久地为人们所忽略，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李林甫的死后遭遇。李林甫死后被杨国忠等人诬构并被唐玄宗追罪为庶人，随后又被肃宗、代宗再三追定为逆贼，其宗党亦受到遇赦不赦的残酷待遇。再加上安史之乱后追究历史责任与以史为鉴的现实需要，李林甫便一步步地被塑造成千古罪臣的形象。传世文献在记述李林甫事迹时，遵循的是彰恶掩善原则，因此，对于他的政绩便尽可能地给予淡化，甚至是避而不谈，这给我们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李林甫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不过，如果我们回归到李林甫生前的

<sup>①</sup>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第172页。

某个时段，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他政绩与待遇的前因后果式变化。例如，开元二十五年七月，玄宗以“几致刑措”，归功宰辅，封李林甫与牛仙客为国公<sup>①</sup>。这虽然不是李林甫一生中最高的封赏，却是李林甫一生中最为纯粹也最为当之无愧的一次褒奖。它对应的便是李林甫主持下开元中后期整体制度改革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玄宗对于他自任相以来所有政治作为的充分肯定。如果没有此后天宝政治的诸种种，李林甫应该是堪与姚崇、宋璟齐名甚至超越他们之上的人物。

第二，政治斗争。这是李林甫政治生涯中最为人所诟病并不断被强化的部分，其中最为鲜明的控诉就是妒贤嫉能与口蜜腹剑。身在高位，类似的人事关系和斗争，向来错综复杂，而要立于不败之地，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善于人事斗争，是固宠保位成功的重要条件，但这能构成充分条件吗？传统史学过分强调这一点，让人产生重大误解，以为善于斗争决定一切。其实，朝廷还有更重要的职能，就是治理天下。天下纷纭，万事种种，难道这也要靠人事斗争来解决吗？参与人事斗争，在人事斗争中进行精心设计和政治选择，这是政治人物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该是全部。对于李林甫而言，他在不同时期所涉身的政治斗争，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与他个人的际遇密切相关，有的也牵涉治理天下的路线之争。

李林甫在早年介入的第一场政治斗争，是宇文融与张说之争，汪篔先生称之为吏治与文学之争<sup>②</sup>。当时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唯有李林甫未受贬黜，其原因就在于，他很快选择了引身中立，没有继续第二阶段的争斗<sup>③</sup>。这体现了李林甫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智慧，史料中却鲜少提及这一点。另一次争斗是李林甫与张九龄，这件事情《资治通鉴》记载得很清楚<sup>④</sup>，也是李林甫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第6830页。

② 汪篔《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汪篔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02页。

③ [唐]李浚撰《松窗杂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10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第6822—6823页。

唯一一次对张九龄进行批评。但是，由于张九龄最终罢相，而且他被塑造为与李林甫相对立的正面形象，这次争斗的程度与影响便被极大地夸大。事实上，李林甫在此前的多数时间里，与张九龄的关系都是相当融洽的，张九龄与裴耀卿的罢相还是源于政事上的优胜劣汰，不应一味归因于李林甫的“小人”作为。也就是说，在整个开元时期，李林甫只是偶涉政争，斗争手段也并未超出正常尺度。

李林甫政治斗争的多发期，是在天宝之后。这时，玄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压缩相权，一方面扶持李适之为左相以平衡李林甫，另一方面又打算重新启用文学一派。李林甫为容身保位，出现了妒贤嫉能、口蜜腹剑等行为，其斗争对象包括卢绚、严挺之、裴宽等人<sup>①</sup>。随后，由于被逼无奈对上太子，李林甫的斗争手段也随之升级，引入了罗钳吉网这样的酷吏手段，但是尽管如此，斗争结果也始终没有脱离玄宗的操控，太子虽然势孤却依然安在，反而是李林甫落到了“怨仇满天下”的境地<sup>②</sup>。至此，李林甫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于是，当杨国忠欲谋夺相权时，李林甫便节节败退。先是萧灵、宋浑出贬，后是王铁族灭，李林甫皆不能救，终于忧怖而死，死后又被杨国忠与安禄山联合诬构为谋逆<sup>③</sup>。

可见，李林甫政治生涯中，影响他身后评价的，并不是被一直强调的开元中不断胜利的与人斗，更不是晚年的节节败退，而是天宝五、六载针对太子的数次大狱，最终的结局依旧是取决于肃宗登上皇位之后，对李林甫的直接否定。

第三，天宝之狱。毫无疑问，肃宗在东宫的遭遇是李林甫死后万劫不复的致命因素。肃宗非林甫所立，这是事实，也不能否认李林甫当初主张立寿王，有着政治投资的嫌疑，但是，这就足以证明李林甫有倾倒太子的直接动因吗？恐怕未必。毕竟，太子之立与天宝之狱相隔了近十年之久，而这期间，

---

① 《明皇杂录》卷下，第22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第6853—6854页、6862页。

②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李林甫传》，第6345—6346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第6896页、6899页、6910页、6917—6918页。

宰相与东宫之间也未有任何矛盾与冲突。真正的原因是，天宝之后，随着左、右相争权以及太子势力的崛起，出现了左相李适之与太子亲党韦坚、皇甫惟明等人交往过密的现象。而宰相不得与东宫势力相交结，这正是玄宗处理最高朝局的一贯原则与底线。在此之前宗室大将信安王李祎的出贬，乃至张九龄的罢相，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寿王瑁的终不得立太子，同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在政争中原本处于劣势的右相李林甫，重新被玄宗所重视，其原因就是要利用他来削弱东宫势力或翦除太子羽翼。不仅如此，玄宗还特地扶持起第四股政治势力，那就是外戚杨氏集团。右相李林甫与新兴势力代表杨国忠等人，联手启动天宝之狱计划，这背后的决定者与推动者正是玄宗本人。玄宗的真实意旨仍在于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至于太子，他如果表现良好确无异心，那么天宝之狱的意义就可以不包括更换太子，只要将他重新置于势孤的安全境地即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预设，李林甫才遭遇到了屡起大狱太子却始终不倒的局面。这局面对李林甫并非有利，但却是玄宗所需要的，李林甫在其中的角色不过是皇帝的帮手而已。

打压太子是皇帝的真实意旨，我们还有一个直接证据，那就是李林甫在这一时期的待遇。天宝六载，李林甫加开府仪同三司，又赐实封三百户，十二月，玄宗“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既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sup>①</sup>。这样的恩宠恐怕也是空前绝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但实际上却透露着诡异与反常，因为此事恰好发生在针对太子的几大冤狱告成之后。换言之，如果天宝之狱非皇帝意旨，而是宰相肆意为之，那么李林甫的政治地位不该如此，李林甫遇到的是变相的“赏功”。如此情势，李林甫之子李岫看得很清楚，他曾指着后园的役夫对父亲讲：“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sup>②</sup>这里的怨仇满天下，就是指针对太子一党的天宝诸狱，而一朝祸

<sup>①</sup> 《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第3238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第6884页。

<sup>②</sup>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第6884页。

至，自然就是指肃宗日后的清算。事实上，肃宗即位后，确实不能直接讨伐自己的父皇，只能将天宝之狱的执行人李林甫等人当作最高的泄愤目标。因此，天宝十五载七月即位于灵武之后，其《即位大赦文》曰：“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逆贼李林甫、王锜、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此后，至德二载，又有《收复两京大赦文》与《册太上皇尊号赦文》，仍是延续前赦的宗旨，即李林甫、王锜、杨国忠等同逆贼，与同安禄山谋逆者一样对待<sup>①</sup>。这里的逆贼与安禄山的叛乱性质不同，仍是指针对太子的行为。可见，李林甫在天宝五、六载两年间的政治作为，最终覆盖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的奸臣恶评。

第四，安史之乱。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资治通鉴》声讨李林甫“在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传世史料也多强调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亲密关系。章群甚至认为，安禄山之叛，主角都是蕃将，导演则为李林甫，李林甫虽然早死，影响却未已，遂使唐室衰落<sup>②</sup>。那么，李林甫与安禄山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对于安史之乱，李林甫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首先，所谓“养成”，传统史料多认为，由于李林甫向唐玄宗建议重用蕃将，这才有了安禄山的权重东北。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即在安禄山之前，唐朝就已经多用蕃将，非玄宗朝所独有，蕃将在边境的活跃，取决于边境形势的客观需要，而并非是李林甫的建议。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安史之乱与盛唐的衰亡不应由李林甫来负责，而是另有其它深

---

① 《册府元龟》卷八十七《帝王部·赦宥第六》，第959页；《唐大诏令集》卷二《帝王·即位赦上》，第8页；《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第604页；《全唐文》卷四十五《肃宗皇帝》，第493页。

②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第248页。



层次的原因<sup>①</sup>。兹不赘述。这里所述的另一点是，天宝后期之所以蕃将渐重，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宗室大将信安王李祎的出贬，以及曾有皇子待遇的汉族大将王忠嗣的被征还朝。此二人本都可以撑起边地防御大局，但是都由于牵扯到太子问题而被废，前者涉及废太子李瑛，后者则涉及肃宗，这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唐玄宗的政治意向与基本取舍。

其次，李林甫是否素厚安禄山？安禄山曾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因冒险轻进致使兵败而被贬为白衣效力，开元末重新崛起于东北，他的提携者乃后来入为左相的幽州节度使李适之，还有其后任裴宽，此二人皆与李林甫为政敌。安禄山在天宝二年针对李林甫的吏部选官案中充当了揭发人<sup>②</sup>，故不该把他看成李林甫一党，因为这一时期他们是一种对立关系。而史料之所以讳言李适之对安禄山的提携与重用，也是因为他与肃宗曾为一党，而且，李适之既然是与李林甫之争的失败者，那么他的势弱形象也为其历史评价提供了保护伞。李林甫与安禄山的关系缓和当在天宝之狱起之后，一方面李林甫树敌过多，另一方面安禄山不拜太子的态度，也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不错，因此，李林甫顺旨推美之，重用蕃将

---

① 胡如雷《略谈安史之乱的性质》，《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第4页《史学》版；吴宗国《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8页；宋社洪《相李林甫是唐治乱之分吗？》，《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62—65页；黄新亚《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第55—60页；彭铁翔《试论“天宝之乱”的乱因》，《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第43—47页；郭绍林《安禄山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75—80页；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第48—54页；李鸿宾《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②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第6857页。